

丛书概述

施廷鏞

(一)

什么样的书才叫做丛书，历来說者不一，现就这一问题略谈个人所见如下：

按丛字的說文訓釋，有总、聚、众等意思。据此，则丛书是统括群书而为一部书的书。但同样具有这种组织形式的书，是否均属丛书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认为首先要有统括群书之总名。如宋俞鼎孙同俞經以《石林燕語辨》、《演繁露》、《懶真子录》、《考古編》、《捫虱新話》、《螢雪丛說》六种书，分为七集，汇编为一部书，不是取其中任何一种书名而为全书之名，是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，题以《儒学警悟》，作为统括群书之总名。这样的书，才是丛书。如果汇集多种书而为一部书，并无统括群书之总名，则不得称为丛书。如清張象津所撰《白云山房詩集》三卷，《白云山房文集》六卷，《考工釋車》一卷，《离骚章句义疏》一卷，《等韵简明指掌图》一卷，在组织形式上虽汇为一函，但它函外的书签上所题的书名是《白云山房詩文集》，并且标明其余三种为附刻。这种有附益的书，就不得称为丛书。

丛书二字见唐韓愈詩云：“門以两版，丛书其间”。以之题为书名者，则始见于唐代陆龟蒙的《笠泽丛书》，这是他个人小品杂文、闲情逸致之作，其曰丛书，自取細碎之义；宋王楙又有《野客丛书》，多属經籍考证之文。二者虽都题曰丛书，实非丛书之体。以后俞鼎孙同俞經合編《儒学警悟》，虽未标丛书之名，但有丛书之实。至明代程荣輯汉魏六朝諸家著述，汇为《汉魏丛书》，那才名实兼备。然而同是丛书，又有义同名異的：曰丛刻、丛刊、丛鈔、汇刻、汇刊、汇鈔、汇编等等。如《金陵丛刻》、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借月山房汇鈔》、《月河精舍丛鈔》、《纪录汇编》之类。还有汇輯前人之著作曰遗书、遗集的，如《岭南遗书》等；有专集一人之著作曰全书、合集、全集的，如《潜研堂全书》、《西河合集》、《三苏全集》等；有集一姓之著作作为家集的，如《黎氏家集》等；有标明几种书的，如《五雅》、《鏡烟堂十

种》等。要确定一书是否属于丛书，不能仅循其名，而应覈核其实。

丛书既系汇集群书而为一书，并题有总名，但一部丛书中所收的书，除了首尾完整、序跋不遗者外，其余裁篇别行、断简殘篇和刪节选录的，是否可以构成丛书的条件，这要看它是否能独自成书，和編輯这本书的意图如何来决定。如选录各书中片段的或个别篇章的論述，像明陈仁錫評选《諸子奇賞》，編者意旨在选择其文，虽然仍存各子书之名，而实与《百子全书》性质迥然不同。又如清吳之振編輯《宋詩鈔》，选取《小畜集》中詩二十八首，《騎省集》中詩二首等等，在編次上虽仍保持原书书名，但所选之詩已不能独自成书，而是一种詩总集。这些便不得称为丛书。

那么裁篇别行、断简殘篇、刪訂节录是否可以独自成书？我从下面几点来谈：

一、裁篇别行：宋陈振孙撰《直斋书录解題》目录类中載有“《唐艺文志》四卷，自《新唐书》中录出别行，监中有印本，”此为后人抽篇单行之例。又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原为《礼記》的二篇，宋时始取出别行，与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合称《四书》。可見篇既单行，与书的地位等同。书之異于篇者，以能独立单行为原則，篇既具有书的条件，实已无異于书，故裁篇以为书，对象相同，斤两相称，以范围言，仍无损其为书。

二、断简殘篇：古典书籍每因年湮代远有所散佚，后人不能得其全书，即以佚存者印行，人們莫不认为独自成书。另有原书早已散佚，乃从所存其他书籍中采而聚之，断圭碎璧，补苴成卷，虽不获見其全貌，亦可略窺一斑。如清乾隆年間纂修《四庫全书》时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輯出佚书五百余种，擇要以聚珍版印行，名曰《武英殿聚珍版全书》，而此种佚书賴以流傳。又如清馬国翰輯《玉函山房輯佚书》，在内容分量上虽不如《武英殿聚珍版全书》之多，而义实相同，并不能因其内容短少，而否认它能独自成书。

三、刪节选录：孔子刪立《六經》，取其合乎儒家思想体系部分，而刪去其不合的一部分，可見《六經》已非全文。后来有从一部书中薈萃其精华而成书的，如《史記选》、《十七史詳节》等等，人們也莫不认为可以独自成书，而不計較其分量。

以上三者都能独自成书，不論一种丛书中仅有其一部分，或者全部都是，皆可作为构成丛书的条件。

从书中汇集的书，有多到千余种，少到两种以上的，只要有統括的总名，都可成立。多的如《丛书集成》，少的如明郭子章輯《秦汉图記》，后者是合《三輔黃图》与《西京杂記》而为一书。

綜上所述，凡汇集两种以上的书籍，不論其中每一种书是否首尾完整，裁篇別行，断簡殘篇，或者刪节选录，不論其分量多少，只要有統括全书之总名，皆可謂之丛书。

(二)

丛书的編刊，由于它的主旨和内容的不同，可分为两大类：

一、綜合性丛书：凡汇集各类性质兼备的书，或者两类以上不能从屬某一基本大类（即第一級类目）的书，皆属于綜合性丛书。一部丛书的性质是不是兼及两类，这要从它所采用的图书分类表来判定。如内容有諸子、有农业，在《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》里是两个基本大类，則不能并入某一类，应为綜合性丛书。如果用《四庫分类法》，則两者均属于子部，应为子部丛书，亦即专门性丛书。

經书在《四部分类法》中是独成一部，与史、子、集三部并列。但按其内容，在今日看来，易屬哲学，詩屬文学，尚书及春秋屬史，实屬兼及各类，就不能視作专门性丛书。

輯佚书大都是断簡殘篇，既认为可以独自成书，但又与其他体裁有別，如清黃奭輯《黃氏遺书考》，内容兼及各类，則应附列綜合性丛书之内。其有專輯一类的，則入专门性丛书。还有作为补遺考訂之用的，如專輯敦煌石室佚存之断簡殘篇的《敦煌石室遺书》等，虽不同于輯佚书，而为用則一，故也可列于綜合性丛书内輯佚书中。

在綜合性丛书中又可再分为下列各类：有以时代为范围，专收某一时代的著述成为一部书的，如

明程荣輯汉魏六朝諸家著作的《汉魏丛书》；有以地区为范围，专收某一地区人的著述成为一部书的，由一邑推广到一省，如明天启三年（公元1623）海盐知县樊維城輯海盐历代著述为《盐邑志林》，清宋世榮輯的《台州丛书》，清陶福履輯的《豫章丛书》；有以一姓为范围，专收同族人的著述成为一部书的，如清晁貽端輯的《晁氏丛书》；有以一人作为范围，专收一人的著述而兼及两类以上成为一部书的，如清王夫之撰《船山遺书》。

二、专门性丛书：这一类的丛书也是根据所采用的分类法来判定。由于类目繁多，不再臚列。但同屬一类的书，也有不同情况，有諸家合編的和一人独撰的，如清丁丙輯《当归草堂医学丛书》和金刘完素撰《刘河間医学六书》等是。而文学丛书則有依体裁区别的，如明黃貫曾編的《唐詩二十六家集》和明臧晋叔編的《元曲选》等。同一体裁，有再按时代汇編的，如明沈泰編《盛明杂剧》和郑振鐸輯《清人杂剧》等；有再按地区汇編的，如清桂中行編《徐州二遺民集》；有再按族姓汇編的，如清王相編的《綉水王氏家藏集》等。諸如此类，可酌情依此复分。

(三)

追溯丛书起源，最早在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，載有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說，似有以一名而統括数书之义。但古簡未見，无从征信，因此也难以确定这些书的性质。其次《周礼》太卜三易：曰《連山》，曰《归藏》，曰《周易》，《連山》、《归藏》都已失傳，内容不詳，仅以《周易》一书推之，則《三易》为統括三书的名称，其义較為明显。至以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称为《六經》（乐已失傳，乃称《五經》），其后增益为《七經》、《九經》、《十三經》等称，以一个总名而統括諸种书名，意义更为明显。《六經》之称，虽早見于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，但不可凭信，应以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所說《六經》为可据，因此，以一个书名統括群书，而含有丛书之义，当起源于汉。

春秋战国时，諸子爭鳴，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才有經学之称，以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号为《六經》，以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。封建階級为維護其統治思想，防止傳誤，在熹平四年（公元175年）将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魯詩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及《公羊》、《論

語》刻在石上，作为标准本。自后叠有仿刻。这种石刻，讲中国书史者认为是书的一种形式，論汇刻群书的形式，当也从汉代始。

我国古代甲骨、石刻、简策等书籍形式，其成分很为繁杂，携取檢閱都很不便，不可能有真实的汇群书而为一部丛书的出现。到了紙笔发明后，书籍以鈔写为主要流傳形式，保藏使用都較前便利，漸有丛书出现，据史书艺文志記載，始見于齐梁时期。《四庫全书总目提要》子部杂家类末按語称：“案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編，而別題以总名者，惟《隋志》載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九卷，录一卷，注曰：陆澄合《山海經》以来一百六十家，以为此书，澄本之外，其旧书并多零失，見存別部自行者，惟四十二家。又載《地記》二百五十二卷，注曰：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，以为此記，其所增旧书，亦多零失，見存別部自行者，惟十二家。是为丛书之祖。然犹一家言也”这一論断，就写本来說，較為恰当。陆任二书，都已失傳，从《隋志》的注来看，这两部书都属于专门性丛书。

自从劳动人民創造雕版印刷术以后，书籍的复制較前更加便利，流傳和搜集的范围也逐渐扩大。但刊印群书而題以总名，首先是后唐长兴三年（公元932），据《旧五代史·后唐明宗紀》：“长兴三年二月辛未，中书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，从之。”这在昔日仍属于专门性丛书。綜合性丛书，以現有傳本而論，則始刻于宋，最早为俞鼎孙、俞經合編《儒学警悟》，刻于宋嘉泰年間。后为左禹錫《百川学海》，此书題“昭阳作噩”，不署年号，但其中所收李之彦《东谷所見录》，成于咸淳戊辰（公元1268），以此推之，“昭阳作噩”当是咸淳癸酉（公元1273），因知《儒学警悟》較《百川学海》实早数十年。

辽金时，最著名的汇刻书，一为辽兴宗重熙年間（公元1032—1054）至道宗清宁八年（公元1062）刻的《契丹大藏》；一为《金藏》，即《赵城藏》，均属专门性丛书，至綜合性丛书尚无所見。

降及元朝，为后世著称的有大德九路本《七史》及《济生拔萃》等专门性丛书。其为綜合性丛书，则有陶宗仪的《說郛》，书虽輯于元，当时仅存稿本，刻印則在明季，应入明刻。

明代刻印丛书，其专门性的有吴郡顾春輯嘉靖九年（公元1530）刊《世德堂六子》，江夏黃貫曾輯，嘉靖甲寅年（公元1554）浮玉山房刊《唐詩二十六

家集》。万历以后，息机子編刊《元人杂剧选》，吴兴臧晋叔輯刊《元曲选》，玉阳仙史編刊《古名家杂剧》等，不但网罗宏富，而刻印亦多精本，后世研究文学者賴以參稽。綜合性丛书，首推弘治十四年（公元1501）无锡华理仿宋刊的《百川学海》。后来竟有以之冒为宋刻者，其精濫可知。次为长洲顾元庆的《阳山顾氏文房小說四十种》，起自正德丁丑（公元1517），至嘉靖壬辰（公元1532）始刻竣，共經十六年，所收各书，多据宋本翻雕，其中有沿避宋諱处。清黄丕烈得到这部丛书中的《开元天宝遺事》，跋其后曰：“书仅明刻耳，在汲古毛氏时已珍之，宜此时視为罕秘矣。”从这里可以知道它的珍贵。嘉靖間吳县袁褊輯刊的《金声玉振集》也很精良。自万历以后，质量逐漸下降，如胡文煥的《格致丛书》等，往往并省卷数，刪落标题，而參訂的人又擅削原文，节略字句，此种刻书陋习，当时已成風气，只求形式，不重质量，难怪清人譏其刻书而书亡。至启禎年間，常熟毛氏汲古閣收藏珍本秘籍，著称于世，而刊印书籍也相当众多，丛书則有《十三經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津逮秘书》、《六十名家詞》、《六十种曲》等等，可惜质量大都欠佳。

清代初期，仍以經史历算等专门性丛书較多。至綜合性丛书，在康熙时期，以曹溶的《学海类編》，搜罗独富。乾隆以后，刻丛书的風气漸盛：仿刻宋元、毫厘求肖的，如黄丕烈的《士礼居丛书》；傳布古籍、校讐最精的，如卢文弨的《抱经堂丛书》；书求罕見、今古俱备的，如鮑廷博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；專輯清人著述、搜亡抱闕的，如赵之謙的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斋丛书》。以上諸家都以藏书家著称，所刻多秘籍珍本。

辛亥革命以后，此風犹存，所刻丛书足資称道的：有兰陵徐乃昌的《积学斋丛书》、《随庵徐氏丛书》；江阴繆荃孙的《云自在齋丛书》、《藕香零拾》；貴池刘世珩的《玉海堂丛书》、《聚学軒丛书》；吴兴張鈞衡的《鐸是居丛书》、《适园丛书》；吴兴刘承幹的《嘉业堂丛书》、《吴兴丛书》；武进董康的《誦芬室丛刻》；武进陶湘的仿宋《儒学警悟》、《百川学海》等，都是志在傳古，犹有乾嘉遺風。自鴉片战争以后，从欧洲傳來影印之法，既无写刻校勘之劳，又无产生錯誤之弊，而印刷千万卷，短時間內即可完成。影印之風因而兴起，雕版印刷漸趋衰落。同光間同文书局影印《廿一史》、《十三經》及一些专供科举

試場用的書籍，隨後又漸翻印曾經刻過的叢書。其能獨自搜輯古籍印行叢書者，首推上海商務印書館，先後印有《涵芬樓秘笈》、《續古逸叢書》、《四部叢刊》等，非但網羅豐富，而所據多為善本，形式劃一，既利參考，又便度藏。就中以影印的《叢書集成》為最浩大。至中華書局所印《四部備要》，一般古典要籍約略具備，內容亦稱精縝，惜系排版印刷，校對不免有舛誤之處，實不如《四部叢刊》既多善本，猶存本來的面貌。當然商務、中華所印的叢書并不止此數種，而其他書局也有叢書的印行，但為數不多，茲不悉舉。

(四)

叢書刻印繁多，為了便利學者查考某一叢書內收些什么書，或者某一種書收于什么叢書，于是便有叢書目錄和索引作為工具。最早的叢書目錄是清顧修編的《匯刻書目初編》十卷，所收的叢書凡二百七十一種，以叢書為綱，注編輯刊印者姓名及年代于下，并附子目，各注卷數、時代及著者姓名，但是隨手摘錄，沒有一定次序，也不分類。《匯刻書目初編》刻于嘉慶四年（公元1799年）。後來有人陸續增補，附于《顧目》之後。有姓名可稽者為光緒元年（公元1875）陳光照續增的新編一卷，補編一卷。這類書目所增補的叢書，少者僅五種，多的也不過二十餘種。另在日本文政三年（公元1820），日人松澤老泉就他在日本所見中國叢書，編印《匯刻書目外集》六卷，補一卷，仍《顧目》之例編排，而著錄的書，互有出入，相比只多幾種。清傅云龙續編《續匯刻書目》十二卷，胡俊章補遺一卷，是以《顧目》為基礎，略加補充。但補充書中有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作為叢書者，可見其收書之濫。清光緒十年（公元1884）吳縣朱記榮編刊《行素堂目睹書錄》十二卷，朱氏是以印售書籍為業的，據他自己目睹的叢書，仍依《顧目》的體例編成《書錄》，著錄的叢書凡三百七十二種。清光緒十二年（公元1886）王懿榮依朱學勤原本重編的《匯刻書目》二十卷，亦據《顧目》而予以增補，分編成經、史、子、集諸類。1918年周毓祁增補二編二十卷，由千頃堂合印。近人羅振玉又輯光緒宣統兩朝續出叢書為《續匯刻書目》十卷，閏集一卷。楊守敬原編《叢書舉要》二十卷，未曾印行，1914年經李之鼎補編增至六十卷，1918年又增訂為八十卷，所增訂叢書九百另種，分成經、史、子、集、

釋、道、前代、近代、自著、郡邑、匯刻十一類，這樣把前代、近代與匯刻強為劃分，未免混淆不清。1928年沈乾一汇集以前各種叢書目錄中著錄的叢書，按書名筆編為《叢書書目匯編》，實即一種叢書索引。序中雖說有所增補校訂，其實增補甚微，訛誤依然。1928—1935年桐城劉聲木編《續補匯刻書目》三十卷，再續補十六卷，三續補十五卷。這三種書目，編者原意是增補以前各種目錄的遺缺，但實際增補不多，而且有些出于杜撰。如舒化民撰的《寶研堂文集》，原屬單行，而劉氏把他的《厚德錄節識》、《呂子節識》等六種書湊合起來，作為叢書，題名為《寶研堂全集》，事實上這六種書并未刊行，因此劉氏對於各書的卷數不能確定，而以□志之。1931年前燕京大學圖書館杜聯誥，在採訪圖書工作中，以所見叢書補訂《沈目》之遺誤，所收之書，僅有百種，但其中不免仍有一二訛誤之處。如《沈目》著錄之《宋詩話八種》，謂毛氏汲古閣刻本，查毛氏《汲古閣校刻書目》及清鄭德懋編《汲古閣校刻書目補遺》都無此刻，但在《津逮秘書》第五集內有此八種，顯然是書賈以殘存零種妄題此名，以冀易售，沈氏未知，竟把它列入叢書目錄內，固屬不妥，而杜氏增為十種，認是全書，以補《沈目》之遺。殊不知原無此叢刻，何所謂全與不全。1934年孫殿起編《叢書目錄拾遺》十二卷，這是他在收售古舊書籍時，以所見叢書增補沈、劉、杜三氏目錄之遺。但此書有將一書之正續編或附錄作為叢書者，故仍不免有濫收充數之嫌。總之，上述各種目錄，互相補正，各有得失，我們不能全把它們作為編查的依據，還須據書考訂，以求真實。

有了叢書目錄，僅可查考一種叢書中收些什么書，但要查考某一書或某一人所著的某書，收于哪一種叢書，就很為不易。自1931年起陸續有編印的叢書子目書名索引和著者索引出現。首先是金步瀛編的《叢書子目索引》和《增訂叢書子目索引》，繼之有施廷鏞編的《叢書子目書名索引》和曹祖彬編的《叢書子目備檢》（著者之部）。這四種索引，都是以所在圖書館的藏書為限，少的只有三十六種，多的也不過一千六百餘種，局限性很大，還不能滿足今日查檢叢書子目之用。

1936年楊家駱汇集各種叢書書目，編了一部《叢書大辭典》，以叢書書名、編印者姓名、叢書中子目的書名、著者姓名等混合起來，按四角號碼加

以編排。這是一種綜合性索引式的叢書目錄。惟所收之書，皆為前人之書目，不僅沿襲舊訛，而且所收叢書六千餘種，實際多屬虛無，流傳于世者并無此數。1959年上海圖書館陸續編印的《中國叢書綜錄》，是匯全國四十個圖書館所藏叢書而編訂的，非但網羅宏富，而且著錄有據，可稱空前的一部叢書目錄。不過所收的叢書，僅為四十個圖書館入藏者，仍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如果把它作為一部中國叢書聯合目錄，較為切合實際；若作為一部中國叢書總目錄，還不能完全反映我國千年來流傳而現仍存于世的全部叢書。即以現在館藏而言，也難免滄海遺珠。就我偶然見到的，如清林慶炳撰《愛梅樓雜著》即未入錄；就是已經入錄的，也未免于

訛誤。如清戚學標撰《景文堂五種》^①，仍沿前人匯刻書目題為《戚鶴泉所著書》；又如清郭柏蒼撰《云間堂全集》^②題為《郭氏叢刻》等等。至于《四庫全書》是不是一部叢書，還值得研究。如果認為是一部叢書，那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應是一種叢書目錄，但各家書目都把它列在公家藏書目錄類，這就成了問題。由此使我深深感到，要編一部完善的叢書總目錄，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① 清嘉慶年間初印本，裝一布函，函外貼有書籤，題為《景文堂五種》，另一方籤詳列子目。

② 曾從郭柏蒼孫則壽處得此書一部，共十一種，在《我私錄》後附有《云間堂全集》總目一頁，所列子目與《綜錄》悉合。

—北京圖書館最近入藏的一批珍本書—

——蕭山朱氏藏書——

蕭山朱翼盒（文鈞）先生，收藏金石、圖書，鑑別極為精審。所藏碑帖，多宋元佳拓，已經全部捐獻給國家。今年北京圖書館又自朱氏藏書中選購旧刻精鈔二百三十餘種，其中有一些是該館覓求多年而未得到的。

在這二百三十餘種書籍中，明清寫本占主要地位。有清一代學者、文人和有名藏書家抄、校、批、注的本子很多，也有一些是著名的原稿本，如清代康熙之間則有宋犖、朱彝尊、曹溶、金檀、趙執信、厉鶚諸家；乾嘉之間則有翁方綱、鮑廷博、卢文弨、孔繼涵、法式善諸家；道咸之間則有刘喜海、勞格、勞权諸家。他們抄校的书都是根据宋元以來旧本精抄細校而成的。这里面引人注意的是厉鶚家抄本《梅磴詩話》，有厉鶚、翁方綱等人的題識。稿本中如吳綺的《蕭瑟詞》、袁通的《捧月樓詩》，都是著者經意手寫的最后定稿，《捧月樓詩》的稿子寫的尤其精緻可喜。

這批書中也有一些很好的批校本，如嘉慶年間金椒吳氏刊印的《晏子春秋》，原是顧廣圻贈給王念孫的，書中有批注不少。又如汲古閣刊本《老學庵

筆記》，經張紹仁據黃丕烈藏影宋抄本校對，又以陸貽典校本重勘，其參考價值非一般的汲古閣本可比。

朱氏藏書中，金石、藝術兩類有許多罕見之品。此次所收的明寫本和明刻本《法帖釋文考異》，萬曆間高拱明校刊的《宣和畫譜》，都是不比尋常的本子。又如刘喜海抄的清代傅洪著的《益都金石略》，是向未見諸著錄的。元至正刊本《金石例》，雖缺短四卷，僅存六卷，也是過去未見的珍本。此外還有許多紙墨精良，原版初印的金石、藝術書，如阮元刻并有手跋的《王復齋鐘鼎款識》，原版已屬難得，而此本還是用琉球旧紙精印的。又如李光映的《觀妙齋金石文考略》，原本雖不难致，但這一部却是初刻版時用開化紙、旧墨精印的，紙白如雪，墨光似漆，書面整潔如未觸手，真可以當做一種藝術品來看待。

其他明清兩代的精刻，是能補該館館藏所未備，茲不一一枚舉。北京圖書館入藏這批書，可以算是一九六二年的一次丰收。私家藏書陸續歸入國家書庫永久保存，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

（希 文）